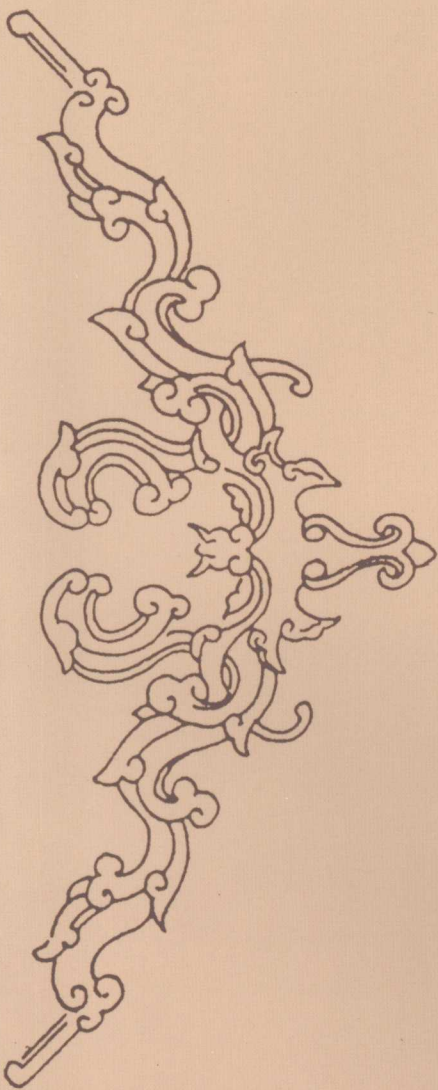


TANGFENG GUAN ZAGA O XUJI

唐风馆杂稿续集

郁贤皓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

TANGFENG GUAN ZAGA O XUJI

唐风馆杂稿续集

郁贤皓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风馆杂稿续集/郁贤皓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
2007.12

ISBN 978-7-81110-364-9

I. 唐... II. 郁... III. 古典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唐代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6840 号

唐风馆杂稿续集

郁贤皓 著

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

(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

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-5108515

发行部 0551-5107784

E-mail ahdxcchs@mail.hf.ah.cn

责任编辑 高 兴

封面设计 孟献辉

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77 千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1110-364-9

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卷上 论学杂著

论胡小石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的建构特点	/ 1
道德文章垂范后学 时间生命奉献社会 ——孙望先生事迹及治学历程述评	/ 25
溯史料本源 循学术规范 ——评《册府元龟校订本》	/ 52
转益多师是汝师	/ 60
叙国家级教材六卷本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 编撰经过	/ 72
附：著名学者谈郁贤皓主编国家级教材《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选》	/ 77
《尧舜传说研究》序	/ 89
《汉代〈诗经〉学史论》序	/ 93
《魏晋哲学与诗学》序	/ 100
《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关系研究》序	/ 104
《晚唐士风与诗风》序	/ 111



《桂苑笔耕集校注》序	/ 122
《唐诗抒情艺术研究》序	/ 126
《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》序	/ 130
《郑虔传略》序	/ 139
《徽宗词坛研究》序	/ 145
《明清文人话本研究》序	/ 148
《采石矶揽胜》序	/ 155
《采石话源》序	/ 157

卷下 文史百科知识讲座

帝王的年号、谥号、庙号和陵号	/ 164
附：历代帝王年号、谥号、庙号、陵号一览表 ...	/ 176
帝王后宫杂谈	/ 195
历代宦官弄权杂谈	/ 202
“和亲”杂谈	/ 214
从“变徵之声”和“律中无射”谈起	
——古代音律常识简说	/ 223
古代刑法琐谈	/ 233
“玄默”“涓滩”是何年？	
——古代诗文中的纪年名称略谈	/ 244
避讳杂谈	/ 250
附：历代帝王避讳一览表	/ 279
后记	/ 293



卷上 论学杂著

论胡小石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的建构特点

从清朝末年林传甲^①、黄摩西^②等人开始撰写《中国文学史》以来,到近几年复旦大学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^③和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^④出版,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是《中国文学史》盛行的

① 林传甲:《中国文学史》(武林谋新室印行,上海科学书局发行,清宣统二年六月校正再版;台北:学海出版社,民国七十五年三月)。据此书首页江绍铨《中国文学史序》称:林传甲于光绪“甲辰夏五月来京师主大学国文席,与余同舍居,每见其奋笔疾书,日率千数百字,不四阅月,《中国文学史》十六篇已杀青矣。……光绪甲辰季冬之望弋阳江绍铨序。”按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(1904),则此书与黄摩西之书为同时之作。

② 黄摩西:《中国文学史》(东吴大学堂读本,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)。据《东吴六志·志琐言》记载,此书始撰于光绪三十年(1904),初稿出版于1907年。见王永健《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》(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)206页引。又见王永健《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——黄摩西所著中国首部〈中国文学史〉》引,台北:《书目季刊》第二十九卷第二期(1995),14页。

③ 章培恒、骆玉明:《中国文学史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6。

④ 袁行霈:《中国文学史》,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9。



时代,总共有数百种之多。这些著作都各有特点,从早期的文学与学术不分,到文学概念的认定;从孤立地论述作家作品,到联系时代社会背景来系统阐述文学的发展;从单纯论述文体的成就,到全面系统地考论各种文学样式产生、发展及其对其他文体的影响等等,都有一个逐步认识和加深进步的过程。近年来,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,对 20 世纪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进行总结和反思,尤其是对早期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教材,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评价。但是对胡小石先生于民国十年(1921)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^①,除了周勋初教授在《文学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说的重要历史意义》^②一文中谈到“胡小石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领域中的贡献”外,其他文章中则很少有人提及。可能是因为胡小石先生的这个讲稿长期没有发表(直到 1930 年春,以其弟子苏拯的笔记,题名《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》,共 11 章,到“五代文学”为止,由上海人文社出版;1962 年胡小石先生逝世后,南京大学成立遗著整理委员会,其中一项就是重印此书,但未能实施;直到 1991 年,才把此书收入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在原来 11 章的基础上,又根据其弟子

① 胡小石: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,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1~204 页,1991。

② 周勋初:《文学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说的重要历史意义》,《文学遗产》,2000 年第 1 期。



金启华的笔记,增补第12章“宋代文学”,前11章保存1930年版原貌不动)^①,许多人不易见到的缘故。其实,胡小石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凡响的。因为他与当时的其他文学史都不同,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建构和体制,具有鲜明特点,对后来他的门人弟子写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因此,本文拟在周勋初教授文章的基础上,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补充。

众所周知,现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这个概念,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,与中国古代典籍中所提到的“文学”一词的意思是不同的。鲁迅先生在论述《论语》等语录体文字时说:“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,我们先前也叫‘文’,现在新派一点的叫‘文学’,这不是从‘文学子游子夏’上割下来的,是从日本输入,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。”^②西方人所说的“文学”这个概念,只是指诗、戏剧、小说等纯文学作品,而中国古代所说的“文学”这个概念却非常复杂,可以泛指各种文献典籍。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分章节论述的文学史。而日本学者却较早接受西学,他们用西方的著作体例编写日本的文学史,接着也写中国文学史。而中国早期编写的文学

^① 见吴徵铸《后记》,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5页,1991。

^② 鲁迅《门外文谈》,《且介亭文集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93页,1981。



史,多受到日本著作的影响。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古代文学史,一是当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传甲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^①,据书前江绍铨《序》,该书写于光绪三十年(1904)甲辰五月到九月。宣统二年(1910)校正再版,至民国三年(1914)已六版。作者在开头小序中说:“传甲斯编,将仿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之意以成书焉。”^②可见它是模仿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的。全书分16篇,第一篇至第三篇讲文字书法、古今音韵、名义训诂;第四篇至第六篇讲古今文章内容的不同和作法的演变;第七篇至第十一篇讲群经、诸子、史书之文;第十二篇至第十四篇讲汉魏至清朝的文体;第十五篇至第十六篇讲骈散两种文体。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根本不属于文学的范围。另一种是当时在东吴大学任教的黄摩西(黄人)写的。据徐允修《东吴六志·志琐言》记载:“光绪三十年,西历一九〇四年,孙校长(孙乐文)以本校仪式上的布置,略有就绪,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;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,唯国学方面,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,何来合适课本?不得不自谋编著。因商之黄摩西先生,请其担承编辑主任,别延嵇绍周、吴瞿安两先生分任其事。一面将国学课择要编著,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,随编随课,故编辑之外,又招写手四五人,逐日写印。如

^① 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,中国台北:学海出版社,1页,民国七十五年(1986)。

^② 同注1,页1~2。



是者三年……理应择要付印。因由黄先生将文学史整理一过。此书系其自己手笔,开头总论、分论、略论,洋洋数百万言,均系惬意之作。以下亦门分派别,结构谨严,惟发抄各家程式文时,致涉繁泛。书虽出版,不合校课之用。正欲修改重印,先生遽归道山,遂致延搁多年。今春(1926年)有王均卿先生愿负修改之责,完成合式之本,付诸铅印,不日即可出版矣。”^①今苏州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有国学扶轮社印行的“东吴大学堂课本”《中国文学史》,署“常熟黄摩西编”,为30册(内有1册为手抄本),到明代为止,全书约170万字(徐允修所谓“洋洋数百万言”乃夸大之辞)。未署出版年代。此本当即陈旭轮《关于黄摩西》(《文史》半月刊1934年第1期)所说“清末东吴大学以铅字油光纸印行”、“坊肆未曾流行”的1907年本子^②。此书内容极为庞杂,第一编“总论”谈“文学之目的”、“历史文学与文学史”、“文学史之效用”,比较拉杂,如认为“三皇之书,为文学权舆”之类。第二编“略论”,谈“文学之起源”,更是从造字说起,以“文字”为中心,列表说明文字所自生的系统:图画到美术、字学、刊印、校订、款识、法帖,语言到文学,结绳到小学,音韵到考古学、韵学等;谈“文学的种类”认为“文字为文学之起点”,“《周礼》六官所掌中,有无数典章,无数学术,即有无数文学。而文学种类之分,盖权舆于此

① 王永健:《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206页,2000。

② 同注①,208页。



矣”。可见其对文学与学术也未分清，内容包含极广。第三编谈“文学的种类”，其中第一章把所有古代公文都包括在内。第四编“分论”是全书主要部分，篇幅极大。分“文学之起源”、“上世文学史”、“中世文学史”、“近世文学史”四章，“上世文学史”以“六经”、“儒家”、“道家”、“法家”、“兵家”、“古小说”、“楚辞”、“两汉文学”为“文学全盛期”；“中世文学史”从晋至宋元为“文学华离期”；“近世文学史”则为“文学暧昧期”。每个阶段有作家小传，然后是大量的作品选，大都没有评价。可见当时的学者多分不清“文学”和“学术”的区别，大多数学人认为读书必先要识字，因此必须先从文字讲起；而掌握文学必须先具备经、史、子方面的知识，有了扎实的基础，才能学文学进入正道。林传甲、黄摩西等人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正是充分体现这些特点的代表作。后来有人主张全部按照西学的方法写中国纯文学史，即只写诗、戏曲和小说，把赋、散文等都排除在外。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国情，所以未能成功。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，赋和散文是重要文类，尤其是作赋必须有才；而戏曲、小说却是小道娱乐之具，有高下之分。

其实，虽然中国出现文学史较晚，但对“文学”的特点则在不断进行探讨，因而“文学”这一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发展。《论语·先进》中说的“文学，子游、子夏”^①，

^① 《论语正义》，上海书店 1986 年影印《诸子集成》本，卷十四，238 页。



是包括文章博学的意义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序》^①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^②中说的“彬彬(《史记》作‘斌斌’)多文学之士”的“文学”，也都是泛指学术方面的博学而言。但到了魏、晋时期，人们对文学与学术的界限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当时出现“文章”一词，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所谓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“文章”，大概是指文学了。其谈到的文人是“建安七子”，其谈到的文体有“奏议”、“书论”、“铭诔”、“诗赋”^③，他认为这些就属于文章的范围。晋代陆机《文赋》未讲“文”的定义，多讲写文的构思和修辞，但从他所说的“思涉乐其必笑，言方哀而已叹”，可知他谈的“文”就是指文学。其中谈到的文章体裁有“诗”、“赋”、“碑”、“诔”、“铭”、“箴”、“颂”、“论”、“奏”、“说”^④，他认为这些就属于“文”的范围。范晔的《后汉书》，特设《文苑传》，所收的都是写诗赋的文学之士，而研究儒家学术的人都放在《儒林传》。此后的史书，如《旧唐书》把文学之士归《文苑传》，《新唐书》把文学之士归入《文艺传》，而把儒学之士则都归入《儒学传》，这就把文学家很清楚地分出来了。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《文选》，把经书(“姬公之籍。孔父之书”)、史书(“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”)、子书(“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”)

① 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，卷一百二十一，3120页。

② 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，卷八十八，3596页。

③ 严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三国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097~1098页，1958。

④ 同注③，《全晋文》卷九十七，2013~2014页。



和“谋夫”、“辩士”之作，都排除在“文”之外，一律不收。而一定要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于翰藻”，“综辑辞采”，“错比文华”之文，才能入选^①。这就把文学的界线划得很清楚了。当时的湘东王萧绎则认为：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。”^②分别从感情和辞采等方面论述文学的特点，已与后代的“文学”概念有相合之处。不过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这一名称，只称“文”或“文章”。《文选》中所选文章，以“赋”和“诗”为主，此外，还有“七”、“诏”、“册”、“令”、“教”、“文”、“表”、“上书”、“启”、“弹事”、“笺”、“奏记”、“书”、“檄”、“对问”、“设论”、“辞”、“序”、“颂”、“赞”、“符命”、“史论”、“史述赞”、“论”、“连珠”、“箴”、“铭”、“诔”、“哀”、“碑文”、“墓志”、“行状”、“吊文”、“祭文”等 34 种文体。大致上是相对于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以外的“集”部的范围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基本上认同以上文体即属于文学的范畴。不过因为《文选》中所选文章多为韵文或骈文，当时就有人称“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”。到了清代，产生了文笔之争。因为从清初开始，文坛上以崇尚“唐宋八大家”散文的“桐城派”占优势，后来就有推崇六朝骈文的“文选派”出现，他们把散句（单笔）且无韵的散文完全排斥在文学之外，这两派一直到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，才开始都遭到批判。对于中国文学的这种特

① 梁·萧统：《文选序》，《六臣注文选》，314 页，1987。

② 萧绎：《金楼子》卷四《立言篇九下》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，29 页。



殊情况，文学史的编写势必与西方的文学史不同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文学的体裁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，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文学样式出现，对于中国历代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，古代学术界也有不少人在进行探索。其中清代“扬州学派”的主要人物焦循曾提出过文学发展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的精辟论述：

商之诗，仅存颂。周则备风、雅、颂，载诸“三百篇”者尚矣。而楚骚之体，则“三百篇”所无也，此屈、宋为周末大家。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，则“三百篇”之余气游魂也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，故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为四百年作者，而东方朔、刘向、王逸之骚，仍未脱周、楚之科白矣。其魏、晋以后之赋，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。……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，及苏、李而建安，而后历晋、宋、齐、梁、周、隋，于此为盛。一变于晋之潘、陆，宋之颜、谢。易朴为雕，化奇作偶。然晋、宋以前，未知有声韵也，沈约卓然创始，指出四声。自是厥后，变蹈厉为和柔。宣城、水部冠冕齐梁，又开潘、陆、颜、谢所未有矣。齐、梁者，枢纽于古、律之间者也。至唐遂专以律传，杜甫、刘长卿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崔颢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之五律、七律，六朝以前所未有也。若陈子昂、张九龄、韦应物之五言古诗，不出汉魏人之所范围。故论唐人诗，以七律、五律为先，七古、七绝次



之。诗之境至是尽矣。晚唐渐有词，兴于五代，而盛于宋，为唐以前所无。故论宋宜取其词，前则秦、柳、苏、晁，后则周、吴、姜、蒋，足与魏之曹、刘，唐之李、杜，相辉映焉。其诗人之有西昆、江西诸派，不过唐人之绪余，不足评其乖合矣。词之体，尽于南宋，而金、元乃变为曲，关汉卿、乔梦符、马东篱、张小山等为一代钜手。乃谈者不取其曲，仍论其诗，失之矣。有明二百七十年，镂心刻骨于八股，如胡思泉、归熙父、金正声、章大力数十家，洵可继楚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以立一门户。而李、何、王、李之流，乃沾沾于诗，自命复古，殊不必者矣。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，舍其所胜，以就其所不胜，皆寄人篱下者耳。余尝欲自楚骚以下，至明八股，撰为一集。汉则专取其赋，魏、晋、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，唐则专录其律诗，宋专录其词，元专录其曲，明专录其八股，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，然而未暇也。偶与人论诗，而记于此。^①

这一段论述，对于后代学者影响很大。如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·序》中一开头就说：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”^②胡适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也说：“一时代有一时代

① 焦循：《易餘齋录》，木犀轩丛书本，卷十五，1a~2a。

② 《王国维戏曲论文集》，3页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4。



之文学。”^①，但他们都没有说明这个学说的出处。只有胡小石先生在他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中明确说明了这一说法的出处是焦循的《易馀籥录》。而各人引用此说的用意和目的也不同：王国维是用来说明戏曲是元代的代表性文学，胡适是用以提倡文学改良，而胡小石先生则是用以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。

胡小石先生生于光绪十四年(1888)，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，其师辈多兼通传统国学和西方新学，所以他的学问既有朴学传统，又有西方新学知识。民国九年(1920)，胡小石先生由同学陈中凡先生介绍，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兼国文部主任，讲授中国文学史、修辞学、诗歌创作等课程。其时《中国文学史》著作和讲稿已有多种问世，特别是谢无量在民国七年(1918)写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，影响很大，多次重印，此书几乎将见之于文字的东西都称之为“文学”。他在第一章第四节“文学之分类”中，列表分“无句读文”和“有句读文”两类，前者包括图书、表谱、簿录、算草；后者又分“有韵文”和“无韵文”，无韵文中有诸子疏证平议的学说，有包括地志、姓氏书、目录、款识及各体史书在内的历史，有各种公牍、典章、杂文和小说，内容极为庞杂^②。当时在北京大学开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先生，据陈中凡先生回

① 胡适：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，35页，上海：良友图书公司，1935年。

② 谢无量：《中国大文学史》，6～8页，中华书局，民国七年(1918)。



忆,其讲稿分“经史、辞赋、古今体诗等篇,近于文学概论。读其内容,实则是学术概论,非文学所能包括”^①。胡小石先生反对章太炎先生在《文学总论》中对文学的主张,说:“近年来的章太炎氏,又主张极广义的:‘凡著于竹帛者,谓之文。论其形式,谓之文学。’照他说来,太无限定。凡公司之股票、神庙之签条,均可称之为文,讲来实不胜其烦。现在若要讲文学的界限,与其失之太宽,不如失之太狭。故宁从阮氏之说,而不取章氏之论。”^②所谓“阮氏”,就是清代“扬州学派”的首领阮元。阮元在《文韵说》中说:“凡为文者,在声为宫商,在色为翰藻。”^③强调文学必须讲究声韵辞藻。主对偶,重骈文。可知这派的文学主张是比较狭义的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胡小石先生努力寻找文学史最理想的建构和框架,最后终于接受“扬州学派”焦循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的主张。焦循在《易馥籀录》卷十五中所说的“学说”,把大量的经、史、子部的东西排除在外,基本上分清了“文学”与“学术”的界限,勾勒出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发展线索,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。所以,胡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,就是以此为基本框架,建立起了不同于前人所写的文学史的体系,这一体

① 陈中凡:《悼念学长胡小石》,南京:《雨花》,1962年第4期。

② 胡小石: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,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,11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。

③ 阮元:《文韵说》,《揅经室续集》(《四部丛刊》本),卷三,页10a。